论卢藏用的家世、思想与文学主张

吕 来 好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卢藏用属于唐代范阳“四房卢氏”中的大房,是北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的五世孙,唐高宗的宰相卢承庆的侄孙。在思想上,唐朝儒释道三教混融,和谐相处,卢藏用顺应了这一历史大势,对儒释道都有很深的研究。唐初开启的复古运动在盛唐有所加强,卢藏用是复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虽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他和陈子昂等人共同为盛唐乃至中唐的复古运动树立了标的,起到了引领文学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 卢藏用;范阳卢氏;道教;复古运动
中图分类号:I 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2-0103-08

盛唐时期,范阳卢氏家族人才济济,卢藏用即是在文学上较为突出的一位。据《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家谱》载,卢藏用曾撰有《范阳家志》五卷,可见他不仅以文学知名,而且家族观念也很强。卢藏用曾经和他的兄长卢微明在终南山隐居①,对道教有很深的研究。卢藏用与陈子昂是好朋友,他们的文学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反对齐梁绮靡之风、倡导恢复汉魏风骨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对此后的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一、家世背景

卢藏用属于范阳“四房卢氏”中的大房,这一房是初盛唐时期范阳卢氏家族中最为兴旺发达的一支。卢藏用的世系非常清晰,他兄弟四人,其兄长为卢微明,两个弟弟分别为卢若虚和卢重玄。根据卢藏用后母李晋的墓志铭可知,卢藏用和他的兄长是同父同母兄弟,而与另外两个弟弟则是同父异母兄弟。据《新唐书·卢藏用传》载:

>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人。父璥,魏州长史,号才吏。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征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登衡、庐,彷洋岷、峨。与陈子昂、赵贞固友善。②

从中可以看出卢藏用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官吏,这样的家庭环境为卢藏用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又与兄长一同隐居学道,有可能是受到家族中宗教因素影响,更有可能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他与陈子昂、赵贞固的友善,应当是文学才华的相互吸引和对道术的热衷而志趣相投。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卢藏用的祖父为卢承礼,曾祖为卢赤松,五世祖为北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他的从祖父卢承庆是高宗朝宰相,地位很高。不仅如此,他的曾祖就和唐高祖李渊有着良好的关系。《新唐书·卢承庆传》云:“卢承庆字子余,幽州涿人,隋散骑侍郎思道之孙。父赤松,为河东令,与高祖雅故,闻兵兴,迎见霍邑,拜行台兵部郎中,终率更令、范阳郡公。”③但是,这并不是说范阳卢氏家族和皇室的关系亲密无间,恰恰相反,范阳卢氏家族与皇室的关系若即若离。这从他与唐太宗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吕来好,男,湖北襄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① 卢微明,《新唐书·卢藏用传》中作“徵明”,但是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相关的墓志中作“微明”,所以这里取后者,应是形近而讹。
②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374 页。
③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〇六,第 4047 页。

这件事亦出自《新唐书·卢承庆传》:“俄兼检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选。辞曰:‘选事在尚书,臣掌之为出位。’帝不许,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① 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君臣间微妙的关系。

范阳卢氏家族的势力强盛的另外一个表现为其他房支也频现知名人物,比如在武后主政时期,“四房卢氏”中第二房的卢献就曾做到鸾台侍郎。在来俊臣大兴冤狱的时候,他曾和狄仁杰等大臣一同被罗织。据《旧唐书·来俊臣传》记载:“如意元年,地官尚书狄仁杰、益州长史任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等六人,并为其罗告。”②卢献后来侥幸逃过一劫。卢献为官比较清廉,这在相关墓志中也有所反映:“洎国朝文昌左丞、黄门侍郎讳献,尝与狄公仁杰、魏公知古当天后朝,同兴安刘复夏之业。今古相对,勋贤不绝,言士族者伟之。”③另外第三房的卢怀慎是玄宗朝的宰相,不过这是后话。第四房也有不少人物,只是不如其他三房显赫。范阳卢氏家族通过与其他大家族联姻,形成了一个更大更加稳固的政治势力圈子:“卢氏自北魏著为旺姓,从高祖曾祖诸父兄弟时所谓清名者,相继在朝,姻缘表里,二台两掖,卢氏之亲过半。”④总体来看,范阳卢氏家族在盛唐时期非常鼎盛,卢藏用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之下。

二、儒释道信仰与天师道家族传统

像范阳卢氏这样的世家大族的儒家思想自然无须赘言。同时,从卢藏用的传记资料可以得知,他对道教颇有研究。时代遥隔之后,学仙求道往往被后人认为是高雅而脱俗的事情,事实并非这样。唐代的道教正是远承汉代的道教传统,近接南北朝时期的天师道风气,外在是彬彬之盛的儒家礼仪,内里却是男盗女娼的不堪。龚自珍在《上清真人碑书后》中对汉代至唐代的道教实质变化有十分深刻的分析:

> 余平生不喜道书,亦不愿见道士,以其剿用佛书门面语,而归墟只在长生,其术至浅易,宜其无瑰文渊义也。独于六朝诸道家,若郭景纯、葛稚川、陶隐居一流,及北朝之郑道昭,则又心喜之,以其有飘飖放旷之乐,远师庄周、列御寇,近亦不失王辅嗣一辈遗意也,岂得与五斗米弟子并论而并轻之耶? 至唐而又一变,唐之道家,最近刘向所录房中家,唐世武曌、杨玉环皆为女道士,而至真公主奉张真人为尊师。一代妃主,凡为女道士,可考于传记者四十余人,其无考者,杂见于诗人风刺之作;鱼玄机、李冶辈应之于下,韩愈所谓“云窗雾阁事窈窕”,李商隐又有“绛节飘摇空国来”一首,尤为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问者也。⑤

女道士的真面目,即是房中术一类的专家,龚自珍论之已详。男道士如卢藏用之类的人,除了研究房中术之类的道家传统技艺,当然还会关注长生、飞升等事情。这些技艺是他们以干人主、求取功名的利器。封建时代的皇帝大多沉迷酒色、渴望长生、崇信佛道,其中的奥秘大约也在这里,就算有些皇帝刚开始时还能励精图治,但到后来往往不能够善始善终,像唐玄宗、唐武宗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学仙修道之人的真面目,冷静而正直的士人是心知肚明的。《新唐书·卢藏用传》中卢藏用与司马承祯的一段简短对话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 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⑥

其中提到“藏用惭”这个细节,说明卢藏用在内心

①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〇六,第 4047 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六,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838 页。
③ 卢愸:《唐故知盐铁转运盐城监事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范阳卢府君(伯卿)墓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陕西:三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9—320 页。
④ 毕诚:《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299 页。
⑤ 龚自珍撰,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7—298 页。
⑥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二三,第 4375 页。

默认了司马承祯的说法,并且对自己的不光彩行为感到十分羞愧。这也就证明道家的各种技艺与走“终南捷径”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有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讽刺的倾向存在。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范阳卢氏家族和清河崔氏家族都是天师道信仰。道教在东汉末期大盛,这些大家族都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陈先生称这些大家族表面上是引人注目的彬彬儒风,内里却是不堪入目的天师鬼道,令人感慨。他在《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说:“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严避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学著于外表,传于后世者,亦未尝不使人想慕其高风盛况。然一详考其内容,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巫民之鬼道,良可慨矣。”①关于崔卢大家族的天师道信仰,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也有论及。田余庆先生也赞同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并且在他的《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陈先生是从海滨地域容易从海上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着眼,认为这些大家族的天师道信仰可能跟域外文化的交流有关。与陈先生探究原因不同,田余庆先生则着重从影响的层面指出卢氏家族的道教传统与刘裕的北府兵一样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二位先生所论充分说明卢藏用的天师道信仰是有着深刻的家族文化渊源的。

卢藏用对佛教也有一定的涉及,他在《衡岳十八高僧序》中称:“藏用早游斯道,颇涉艺文。承日真之恩奖,闻众公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见期人。倘兹理或存,亦旦暮之斯也。”③卢藏用自称“早游斯道”,应该对佛教有不少了解。佛教典籍丰富,对他的创作可能会起到一些启发作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唐代的知名文人对佛教似乎都不陌生,除了像王维这样的笃信者之外,卢藏用就是对佛教有较多了解的一个代表。

唐代的佛道文化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时代风气,在士大夫的家庭中更是如此,而且这些信仰和儒家文化往往并行不悖,和谐相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可以从卢藏用后母赵郡李晋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细节略见一斑,李晋的墓志中这样描述道:“睿宗时,藏用迁黄门,微明任御史,并宦达有恩,诏受赞皇县太夫人,寻又加赵郡太夫人。每正朔朝觐皤皤然,微明戴铁冠,藏用拽朱绂,左右扶持入禁内,儒者荣之。开元八年,从微明宰浚仪,崇信释典,深悟泡幻,常口诵金刚般若经。”④睿宗的时候,因为卢藏用兄弟显达,他们的后娘李晋也跟着被两次加封。他们朝觐的时候,仪式隆重,受到士大夫们的羡慕与尊重。藏用的继母是赵郡李氏,也是山东著姓。此类例子在这些世家大族的墓志中十分常见,说明风气所及,这些大家族的家庭成员也望风而靡。关于儒学与佛道在这些士大夫们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当时的人们也有相关的表述,卢思道的八世孙的墓志中是这样说的:“府君讳寂,字子静,范阳涿人也。即北齐黄门侍郎思道之耳孙。……公年高卜性胤天,惟三二宗儒学,一从释氏,虽幼冲而未立,亦训导而可至。”⑤这种儒学与佛教的混融状态是唐代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种十分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三、推崇复古的文学主张

卢藏用的文学才华,在他早年的时候就崭露头角。《旧唐书·卢藏用传》云:“藏用少以辞学著称。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⑥他一生的著述也相当丰富,据《新唐书·艺文志》可知,他著有《春秋后语》十卷、注《老子》二卷、《子书要略》一卷,另外还有文集《卢藏用集》三十卷。可是,今天卢藏用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却并没有多少。《全唐诗》中存其诗歌八首,《全唐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9 页。
②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01 页。
③ 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403 页。
④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 1309 页。
⑤ 柳寥:《唐故太子司议郎卢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 1877 页。
⑥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四,第 3000 页。

文》中他的文章也只有《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和《析滞论》等寥寥数篇。尽管如此,通过他仅存的篇章、他与陈子昂的交游以及当时和后世人对他们的评价,还是可以搞清楚卢藏用文学主张的大体状况。

《旧唐书》在卢藏用的传记之后,将其中一卷人物作了总的赞语,称卢藏用是“文虽堪尚”:“赞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谭为美风。苏、李文学,一代之雄。有惭辅弼,称之岂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与卢、徐,皆攻翰墨。文虽堪尚,义无可则。备位守常,斯言罔忒。”①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卢藏用的文学受到了史学家的肯定。至于说他“义无可则”,则是对他晚年政治生活的总结。文学成就与政治成败没有关系。在政治上没有是非好坏,只有成败存亡。卢藏用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得到了肯定,甚至相当高。《新唐书·萧颖士传》称萧颖士:“所许可当世者,陈子昂、富嘉谟、卢藏用之文辞,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学而已。”②由此可见,卢藏用在古文运动成员萧颖士的眼中,就是和陈子昂、富嘉谟相颉颃的知名文章家。陈子昂的文学成就被今古人论及得很多,富嘉谟的则相对比较少。实际上富嘉谟的文学才华很高,他与吴少微的文章在当时被称为“富吴”体。有一个时期“富吴”二人同在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而另外一个文章家谷倚也在晋阳任职,一起被称为“北京三杰”,证明他们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卢藏用和陈子昂一起掀起了一股复古的思潮,对齐梁浮靡文风进行了批判,为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卢藏用的思想非常通脱旷达,这在他的《析滞论》中说得最明白。该文借主客问答的形式,阐明了事在人为,成事由人不由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也不否定儒家礼仪和传统文化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他的文学主张则是他的这种积极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体现。他为陈子昂的文集作序,高度赞扬了陈子昂的文学成就。他们二人趣味相投,都主张矫正六朝的绮丽文风,回归汉魏风骨。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这样说道:

> 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君讳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精、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故其谏诤之辞,则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则议论之当也;国殇之文,则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也。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③

他对陈子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这些都着眼在文章的政治功用上。蜀地人杰地灵,山灵毓秀,陈子昂、李白、苏轼都是蜀地孕育的绝代才子。杜甫曾经在《陈拾遗故宅》诗中赞美陈子昂道:“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④从屋子说到人,对陈子昂的文才韬略和肝胆忠义都作了肯定。韩愈在《荐士》长诗中也称赞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其九中对陈子昂的评价更高:“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⑤将陈子昂对诗歌的贡献与范蠡协助越王勾践平定吴国相类比。《史记·乐书第二》中就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说法⑥。卢藏用的观点当然是这种文章与政治相一致的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士大夫除了关注江山社稷和天下百姓外,也有个人的身世命运、亲情、友情等多种情愫,像庾信等人虽然用了骈文的形式,但是对这些感情表达得都很好,应该给予肯定。而卢藏用从维护正统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一概予以痛斥,则显然是矫枉过正了。尽管如此,他对陈子昂的称颂,大体符合事实,对纠正当时的浮靡文风起到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四,第 3007 页。
②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〇二,第 5770 页。
③ 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402—2403 页。
④ 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947—949 页。
⑤ 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2 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181 页。

了“横制颓波”的作用,开启了古文运动和盛唐文学的先声。

在唐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学风格:“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①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捍卫封建王朝的风气勃兴。就在这样的状况下,颜真卿还是怀着“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追求。他在代宗永泰元年(765)为孙逖所写的《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中这样说:

> 古之为文者,所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咏歌,终乎雅颂。帝庸作而君臣动色,王泽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然而文胜质,则绣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质胜文,则野于礼乐,而木讷不华。………卢黄门之序陈拾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 何则? 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 盖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运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仆射孙公乎! ……真卿昔观光乎天府,实荷公之奖擢,见命为序,岂究端倪! 时则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阀阅,盖存之别传,此不复云。②

这段话还是从文章的抒情与言志的两大功能说起,然后又转换到了文质的话题上,好像抒情就注定文,言志就必然会质朴一样。文与质的矛盾是文学自身的形式问题,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对魏徵、颜真卿的说法就会理解得更为准确。他们不是站在一个文学的立场上看文学,而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以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一个臣子与封建官僚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所以才会出现抒情与言志的混乱,文与质的矛盾。他们的立场都是儒家的中庸之道,魏徵是要调和南北文风,兼取两者的长处,本来是南朝的长于抒情与北朝长于言志的文风的融合,被他阴差阳错、张冠李戴地说成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颜真卿的观点与魏徵的观点不谋而合,都是强调中庸、适中。从材料的最末部分来看,颜真卿进士及第受到过孙逖的奖掖,所以他对孙逖的评价是带着感激之情来说的。他认为沈约批评谢灵运过了头,而卢藏用赞美陈子昂也同样是誉美太甚。颜真卿虽然批评了沈约和卢藏用,但同时也觉得他们的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最终还是略带否定之意:“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 何则? 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 盖不然矣。”颜真卿为什么认为沈约和卢藏用虽然有情可原,但还是不对,有失公允,用颜真卿的话说就是“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 颜真卿给出的证据是:抒情的传统自古就一直存在,这是人性中合情合理的东西,人是感情的动物,尤其是男女之情,以桑间濮上为代表的郑卫之音正是这种感情的典型代表。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和朝廷的正统也不只是王室衰微的曹魏正始年间和唐朝才有。如果说魏徵的融合南北文风的要求是唐王朝维护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在文学上的反映,那么颜真卿对孙逖的高度肯定就是基于:孙逖既积极捍卫封建统治秩序,又没有因此而斫伤文学应有的疏导人情的功能。既要替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又对已经自觉的文学持有肯定与欣赏的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魏徵和颜真卿达成了一致,只不过他们都搬出儒家文质彬彬的中庸之道作为其挡箭牌而已。

魏徵和颜真卿能够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对已经诞生的纯文学持以认可和包容的态度,这已经相当不易了。比起陈子昂的矫枉过正更理性,也更为客观,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更为持久的指导意义。稍后的皎然由于没有政治上的顾虑,所以观点就更为明晰了,他在《诗式》卷三的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条如是说:

> 卢黄门《序》,评贾谊、司马迁“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让长卿、子云“‘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

①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七六,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730 页。

② 董诰等编:《全唐文》,第 3415—3416 页。

> 辞。”又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乎!”予因请论之曰:……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数独归于陈君乎? 藏用欲为子昂张一尺之罗盖,弥天之宇,上掩曹、刘,下遗康乐,安可得耶? 又,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咏怀》之作,难以为俦。①

皎然是一位僧人,与魏徵和颜真卿的身份差别巨大,这种与政治的疏离,使他能够从纯文学纯艺术的角度对卢藏用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做出公允评价。材料说得十分明白,皎然通过将陈子昂与汉魏晋南北朝的作家从“笔”与“诗”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指出卢藏用的“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的论断不符合历史实际。皎然又更进一步地将陈子昂向来被称道的《感遇》三十八首与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作比较,认为前者不如后者。最后皎然自信地说,卢藏用的序文或许能够保存下来,千年以后,有见地的人恐怕会和他一样对卢藏用的观点不以为然、拍案而起吧! 如果我们能够关注到初唐的时代风气,也就是文学的春天刚刚到来,正好经历过严冬的考验,含苞待放。卢藏用与陈子昂是好朋友,我们站在他歌颂朋友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他的偏执之论也就会见怪不怪了。皎然的观点固然更客观,也更接近艺术的真实,只恨其未得卢藏用之心,令人不得不为此而再次拊掌。到了明代的胡震亨,评价就更加理性客观了,他在《唐音癸签》卷五中说:

> 唐人推重子昂,自卢黄门后,不一而足。……独颜真卿有异论,僧皎然采而著之诗式。近代李于鳞加贬尤剧。余谓诸贤轩轾,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王弇州云:“陈正字淘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第天韵不及。”胡元瑞云: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虽不能远追魏晋,然在唐初,自是杰出。斯两言良为折衷矣。②

胡震亨赞同王世贞和胡应麟的说法,认为他们既看到了陈子昂洗净六朝铅华的功劳,又指出了他锻炼不足的缺点。其实,我们不必根据当时人的只言片语就断定他们的文学主张一定是怎样的,而只能说是有某种倾向。比如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可是他又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可见他对齐梁诗人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只是更倾向于建安风骨。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应当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真实选择。前文提及《旧唐书·卢藏用传》:“藏用少以辞学著称。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③可见他也是一个热衷文学的人,他现存的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的诗歌也与陈子昂一样,有一种古朴慷慨之气,抒情真挚。同时他的文又有着浓重的骈文痕迹,像他为陈子昂文集写的序就是如此。

情志是人性中固有的,也是永恒的。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作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就必须为捍卫封建统治而尽心尽力,这就是历来被宣扬的“高尚”志向,所以他们只能够发乎情性,止乎礼义。他们要将个人的情感纳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文化框架中,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喋喋不休的“儒学”或者“王道”之类的东西。这也就形成了一个人为制造的矛盾,即文学在自觉过程中的泄导人情的基本功能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矛盾。颜真卿提到的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其实也是这一对矛盾的反映,即诗人的赋多一些儒家的礼仪规范,而词人的赋则表达自己的感情更加浓烈一些,像东汉时期的抒情小赋。扬雄说不定就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上针对抒情潮流的逐渐高涨而说的。魏晋南北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混乱的时期,所以才给了人们礼仪衰、王道废的心理创伤感。一乱一治本是历史的固有规律,而在魏晋南北朝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学自身的各种条件都逐步成熟,她终于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从桎梏中解脱出来,破茧为蝶,翩翩而飞。其实经学就好像是文学的母体,文学的诞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分娩过程。到了唐宋时期,还有“诗

① 皎然撰,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1—222 页。

② 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4—45 页。

③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四,第 3000 页。

庄词媚”一说,本质上讲也只是为纯文学这个孩子正名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对南北朝的文学,尤其是齐梁文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是像唐代一些矫枉过正的人那样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以同样的视角,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的说法也值得反思,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曹植的《白马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都是感情真挚的作品,慷慨豪迈,一点也不绮靡。就是曹丕的《燕歌行》抒写男女相思之情,也不显得淫靡,而是真切感人。

对唐代早期的文章,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说得非常精彩,经常被文学史论家引用,其辞曰:

>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①

陈子昂这里称文章之道被遮蔽已经有“五百年”了,而卢藏用在为陈子昂写的文集序中也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其实,是他们共同的文学趋向使然,他们都把建安看作标的,从建安元年(196)到武后时期,刚好大约“五百年”,所以这个“五百年”是有所指的,并非信手拈来。陈子昂在文中指出“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也透露出他的心之所向。陈子昂对文章的追求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与兴象玲珑、风神独具的唐诗有内在的统一性。而盛唐的诗文正是沿着他们所期望的道路发展着。从陈子昂的论断看,他虽然有点激愤,但是追求的还是文学的成熟与完美。

陈子昂写给卢藏用的诗歌都是他随军出征辽阳时候写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一共有七首,依次吟咏了轩辕台、燕昭王、乐毅、燕太子丹、田光先生、邹子和郭隗,表达的都是慷慨之气与志不得伸的郁结。比如咏郭隗的一首为:“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②陈子昂借郭隗的幸运与自己的命途多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世之慨叹溢于言表。

在陈子昂死后,卢藏用十分悲痛,写下了诗篇来表达这种沉痛的心情。诗歌的格调和陈子昂的诗歌很类似,这种默契正是他们文学主张相同的结果。诗歌的题目为《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旧游》,且看这首诗:

> 暮川罕停波,朝云无留色。故人琴与诗,可存不可识。识心尚可亲,琴诗非故人。鸣皋初梦赵,蜀国已悲陈。感化伤沦灭,魂交惜未申。冥期失幽报,兹理复今晨。前嗟成后泣,已矣将何及。旧感与新悲,虚怀酬昔时。赵侯鸿宝气,独负青云姿。……埋没经济情,良图竟云已。坐忆平生游,十载怀嵩丘。题书满古壁,采药遍岩幽。子微化金鼎,仙笙不可求。荣哉宋与陆,名宦美中州。存亡一暌阻,岐路方悠悠。自予事山海,及兹人世改。传闻当世荣,皆入古人名。无复平原赋,空余邻笛声。泣对西州使,悲访北邙茔。新坟蔓宿草,旧阙毁残铭。为君成此曲,因言寄友生。默语无穷事,凋伤共此情。③

这首诗开篇借景抒情,卢藏用使用了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在稍事铺垫后,卢藏用就点出了两位友人相继去世,自己伤心不已的情状。以上是第一节,对自己两位朋友的离世作简略交代。从“赵侯鸿宝气,独负青云姿”到“埋没经济情,良图竟云已”是第二节,分别对赵贞固和陈子昂做了详细的回忆,写了赵贞固的才华,也写了陈子昂的各方面才能和他的主要人生经历,对他们的英年早逝感慨不已。余下的部分是第三节,卢藏用写了自己的生平遭际,有对荣辱的感叹,也有对朋友间转眼就生死暌隔的悲伤,以与平昔好友共勉的悲情结束全诗。

卢藏用的诗文保存下来的不是很多,但是四杰和陈子昂的诗文保存得相对完整。从四杰和

① 陈子昂撰,徐鹏校:《陈子昂集》,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5 页。
② 陈子昂撰,徐鹏校:《陈子昂集》,第 23 页。
③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998—999 页。

陈子昂的作品看,他们的作品也是以骈文作底子,只是在立意和取向上有改变齐梁以来浮靡文风的追求,并且也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卢藏用应该和他们的观点大致相同:一方面继承了齐梁文学中有益的因素,一方面又希望洗净六朝文学中的铅华,可谓功过相埒。因为他对陈子昂反对齐梁绮靡文学的主张给予了基于二人友情的过高评价,最重要的是他后来依附太平公主在政争中失败,所以虽然在文学上虽有不羁之才,然而毁誉参半。

综上可知,卢藏用属于范阳卢氏家族"四房卢氏"中的大房,世胄蹑高位,属于显赫的山东世家大族。卢藏用顺应了时代潮流,思想中儒释道成分都有,呈现出一种混融的状态。卢藏用在文学上主张恢复汉魏风骨,洗尽六朝铅华,与陈子昂一道为复古潮流导夫先路。

On Lu Zangyong's Family Background, Thought and Literary View

Lv Lai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Lu Zangyong (卢藏用) was the great-great-grandson of Lu Sidao (卢思道) who was the Yellow-Gate Assistant Minister (黄门侍郎)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550 – 577). Lu Zangyong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eldest one of the Lu's Four Brothers (四房卢氏) at Fanyang (范阳)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also a grandson of Lu Chengqing (卢承庆) who was Prime Minister of Emperor Gao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唐高宗). Ideologicall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mixed together and co-existed in a harmonious way in the Tang Dynasty. Lu Zangyong followed the historical trend, and made a profound study of these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 The Prose Innovation Movement (复古运动) which was started at the Early-Tang Dynasty was reinforced in the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Lu Zangyong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this movement. Lu Zangyong, Chen Zi'ang (陈子昂) and others set up a standard for the Prose Innovation Movement in the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even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Lu Zangyong (卢藏用), the Lu's Family at Fanyang (范阳卢氏), Taoism, Prose Innovation Movement (复古运动)

(责任编辑 管 琴)